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丛书

要有一个革命党

毛泽东的建党观

柳建辉 李聚山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丛书

要有一个革命党

——毛泽东的建党观

柳建辉 李聚山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85号

要有一个革命党
——毛泽东的建党观
柳建辉 李聚山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32开本 7.25印张 155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620—1014—5/D·966

印数：5,000 定价：4.00元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丛书》编委会

2628/12
主 编 彭 明

副主编 程安辉 吕明军 戴茂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地久 吕明军 李德福 陈答才
柳建辉 彭 明 程安辉 戴茂林

前 言

作为一代伟人之一，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思想理论界的巨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现代思想的各个领域大都深深地打上毛泽东的印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并举，熔东、西文化于一炉，既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又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理论丰碑。

这是毛泽东遗留给我们的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但改变了我们的昨天，也在影响着我们的今天，而且必将伴随着我们的明天。

毋庸讳言，毛泽东在其理论创造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一些失误和偏差。对那些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人们视线、束缚人们手脚的谬误进行剖析，作出科学的评价，正是我们今天继续前进的必要条件。历史的车轮不允许我们躲在毛泽东的树荫下裹足不前。

毛泽东的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需要学界同仁的合力奋斗。限于学识和条件，我们只能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暂时奉呈《谁主沉浮——毛泽东的民主与法制观》、《要有一个革命党——毛泽东的建党观》、《民众大联合——毛泽东的统战观》、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的经济观》、《崇教育以培国本——毛泽东的教育观》、《生存、温饱、发展——毛泽东的人权观》、《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的廉政观》、《博大精深的兵学宝库——毛泽东的军事观》、《孜孜以求的哲学大师——毛泽东的哲学观》等几本尚显稚嫩的小册子,以示我们对毛泽东的敬意。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丛书》

编委会

引 言

政党，是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一定阶段或阶层的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代表。在现代社会，几乎没有那一个阶级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一个阶级为了实现或者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一定要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统一本阶级的力量或行动。因此，每个政党都要有它一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系统，吸收在政治上合乎本阶级需要的并与自己的政治见解相同的人入党，或者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力图扩大组织，发展势力。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发展，各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中国近现代政党产生发展的内部基因；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专制势力的压迫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则成了中国近现代政党产生、发展、变化的外部条件。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产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党，曾经扮演过不同角色，起过不同的历史作用。无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每个政党的活动重心总是放在夺取政权、参加政权或巩固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上。然而，中国近现代政党史表明，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只有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说过：“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

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仅锻炼得更加坚强，而且总结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建党学说。毛泽东的建党原理和建党路线，保证了在中国建设一个具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中国共产党由1919年五四时期开始的共产主义小组，到1921年诞生时的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拥有5000多万党员、领导着全国政权的大党，的确同毛泽东建党原理的指导分不开。因此，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总结与研究，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更是目前形势下理论工作者的一项光荣任务。

本书正是在上述历史的启示与现实的需要下，专门研究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部初探之作。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科学概念，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明确提出了。1977年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曾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建党学说。他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那么，毛泽东的建党观或建党学说的科学含义是什么呢？根据党的文献、党的领导人的论断以及近年来学术界的

比较一致的看法，毛泽东的建党观或建党学说至少包含以下几个要素：〈1〉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观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2〉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和自身建设规律的科学。〈3〉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领导作用以及如何实现正确领导的科学。除以上三点外，我们认为可否补充上一点，即毛泽东建党学说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党际关系，建立和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科学。中国共产党不是真空中的一个政党，而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产生的前后，都有许多的政党产生和发展着。因此，如何看待这些政党，如何处理同这些政党的关系（建国后又有如何看待国际上的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和社会主义国度里，确立正确的党际关系和政党制度，确是毛泽东建党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这就形成了其建党学说中的一部分，并具有其鲜明的特点。

本书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展开了对毛泽东建党观或建党学说的探论。具体说，就是研究毛泽东关于为什么要在中国建党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 and 政治纲领的学说；关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的理论；关于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以及在领导中如何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等问题。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阐明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科学理论体系，如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一

笔宝贵财富，它将长期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内容博大、精深，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有新的发展和运用。撰写本书的目的，是试图阐述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及其相互联系。作为一个初步成果，我们深知其中存有不少的缺点、不足之处，但如能引起热心并有志于此问题研究的同志们进一步讨论，提出宝贵意见，作者的愿望也就达到了。正是本着这样的动机，我们展开了毛泽东建党观原理如下问题的论述。

目 录

引言	(1)
一、深植于中国之沃土——毛泽东建党观的产生与发展	(1)
(一)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党林立的中国说起	(1)
(二)历史的启迪、现实的呼唤	(8)
(三)毛泽东建党观的发展轨迹	(20)
二、理论与实践的交融——毛泽东建党观的	
基本特征	(31)
(一)时代国情与特殊环境	(31)
(二)科学总结与经验提炼	(41)
三、神经中枢——政党政治建设篇	(51)
(一)政党的先锋队性质	(52)
(二)政党的纲领和路线	(61)
(三)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	(73)
四、精神变物质——政党思想建设篇	(83)
(一)吾党哲学之根据	(84)
(二)思想路线的探求	(85)
(三)井冈山的正确抉择	(94)
(四)真正从思想上入党	(102)
(五)百炼成钢	(106)
五、凝聚力与战斗力——政党组织建设篇	(111)

(一) 理论轨迹回溯·····	(112)
(二) 内涵·····	(118)
(三) 最根本的组织原则·····	(123)
(四) 党的骨干·····	(131)
(五) 党的战斗堡垒·····	(140)
(六) 党的细胞·····	(145)
六、显著标志——政党作风建设篇·····	(153)
(一) 党风质的规定性·····	(153)
(二) 崭新风貌·····	(162)
(三) 建设之路·····	(178)
(四) 发展根本动力·····	(186)
七、领导核心——政党领导篇·····	(192)
(一) 唯一正确选择·····	(192)
(二) 前提与原则·····	(197)
(三) “桥”或“船”的问题·····	(203)
(四) “班长”与“霸王”·····	(208)
(五) 党制观·····	(210)
(六) 生命线·····	(213)
(七) 加强领导，理顺关系·····	(217)
后记·····	(222)

一、深植于中国之沃土—— 毛泽东建党观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研究毛泽东的建党观，首先必须科学地正确地阐明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的主客观条件（或历史条件）和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建党观的历史特征、基本原理等问题。毫无疑问，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袖之一的毛泽东，其建党观的产生与发展，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这块沃土之上的；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启迪与中国革命现实呼唤的结果；更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一）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政党林立的中国说起

政党制度是世界各国广泛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而16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在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之下，由于国门的被迫打开，伴随着西方列强野蛮侵略势力的入侵，西方政党制度的种种学说与意识也悄然而来，使中国的政治逐渐染上了一

种政党政治的色彩。尤其是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变迁与发展，客观上为民初年政党与政党活动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众所周知，中国曾是一个创造过高度封建文明的东方大国。其绝对皇权之下的集权制度和专制政体，虽然从总的来说保持了国家统一，没有再出现过大的超军事意义的长期割据状态，但这一政治发展的特征却加重了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建设任务的艰巨程度。明朝中叶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开始有了一些微弱而意义深远的变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结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打断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使中国社会性质及其政治的发展趋向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西方列强以血与火的严酷入侵方式，使古老沉寂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裂变：一方面，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及其文明的基础起了一定的解体性作用；另一方面，又为现代社会及其文明的兴起提供了某些条件和可能；促成多种新兴政治力量的兴起，使中国政治发展带上了更为多元的阶级阶层背景。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新兴阶级的产生，则是西方列强之侵入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作用之突出表现。毛泽东说过：“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

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①因此，作为新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这两个阶级一旦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便注定要给社会的政治变迁注入新鲜的内容。后来的事变也证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分别充当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原动力和领导者。与此同时，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也大大地加剧了。虽然这个阶层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但他们的革命性比较强。虽然他们基本上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但又同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其他阶级阶层不同。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具有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富于政治敏感的特点。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较为强烈，政治活动手段和方式也较为新颖，在当时中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提到某种先锋的作用。在政治活动方面，他们热衷于结成社团，进而发展成政党。中国政党史上的一个常规性的现象，就是几乎每一政党草创之际，实际上首先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组织。由于这一阶层的构成甚为复杂，随之出现的政党或政党性组织同样是五光十色、丰富多样的。这一点，既是我国从19世纪末以来多党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当时政党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

据有人考证，中国之产生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约始于清末孙中山、梁启超、张謇等人创立的同盟会、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其后数十年间，陆续出现过的政党或政党性组织，大小小小，形形色色，数目达千余。举起纲领明确、组织完备、存在经年、影响较大者，亦有30余个。作为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就运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7页。

用了现代政党的政治组织形式。但由于经济利益、政治态度、社会意识结构的不同，该阶级又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和集团，进而又相应地形成了若干个政党。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派别中存在的歧异，成为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党林立现象的首要原因。

对于这些林立的政党来说，如何正确地提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纲领、政策及其口号，并依据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适合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的纲领、政策及口号，的确是一个难题。而这又决定了该政党的政治发展道路及其政治命运是否长久的问题。就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政党来说，起初大都选择了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然而，中国封建专制集权势力强大、凶残、反动，求其改良无异与虎谋皮，于是他们又转而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却怯于敌我悬殊而不敢革命。因此，由于无法选择和确定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绝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政党除在狭小的圈子里作些舆论宣传外，很难有什么大的政治作为。应当指出的是，孙中山对于这一难题的解决有着拓荒之功。首先，改良不成，则暴力革命，搞武装斗争；其次，敌我悬殊，则“首都革命”与“边疆革命”双管齐下，先搞区域性的武装斗争，而后争取推向全国。所以，孙中山总是设法建立或利用一支军队，依据一块地盘进行政治活动，使其所领导的政党有了一定的政治作为，取得了较大的历史地位。为此，毛泽东曾真诚地指出，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先生。尽管如此，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前，辛亥志士们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壮举却没有给这位先生带来最终的胜利。原因何在呢？毫无疑问，战争和军队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斗争形式和主要组织形式，但这毕竟只是形式。此时，中国政

治发展过程的基本内容，只能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脱离了这一点，纵使有军队、有地盘，纵使能够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却终无最终巩固之可能。孙中山由于没有解决这一点，其政党也没有找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终于没有巩固住自己的政权。同时，当时的各政党在如何组织和动员群众方面也没有找到正确的与民众结合的途径，这也是导致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西方政党政治的经验，政治动员往往以合法或半合法的方式进行，其手段主要是舆论宣传。至于政治参与，则在全国政权转入资产阶级之手后大规模展开，其手段主要是靠选举。对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奉之为圭臬，其主要活动也是靠舆论鼓吹，争取宪政。但它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不是西方，中国政治也不是西方政治。在中国，统治阶级顽固而残暴，有着严格的思想控制制度，不允许任何实质性反对舆论的合法存在；同时，国民文化素质较低，政治参与意识较差，大多数人既无法接受语言文字的舆论宣传，又不适应那种以投票行为为基础的个人型参与，往往是草率视之，听天由命。结果，西方意义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方式，在中国承担不了宣传和动员群众的任务。孙中山长期认识不到这一点，影响不了广大群众，因而其军事行动往往流于军事冒险，甚至为反动军阀所利用。至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对民众的影响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因此，他们也就难于领导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深入展开。

鸟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可以从中得出这样一个历史的结论：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未能完成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抉择，而能够抉择中国正确之发展道路的阶级及其政党，注定要成为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主导